

山风浩荡,文脉绵长

——阿苏越尔《山候》的文学气象

□ 周其伦

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版图上,彝族文学以其独特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底蕴占据着醒目的位置。阿苏越尔的长篇小说《山候》,不仅是作者从诗歌到小说领域的重要突破,更是一部兼具历史厚度、人文温度的乡土题材力作,为喜爱他的读者带来新的惊喜。

作品以20世纪80年代初凉山彝区土地分包到户为时代背景,将一个名为鹿鹿觉巴的村庄置于社会转型的风口,用散点式叙事徐徐铺开,缓缓勾勒出大凉山深处的生命图景与文明流变。阅读过程,如同一次穿行于云雾缭绕的群山之间,既能听见历史的足音,又能触摸到一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坚守与蜕变的脉络。

《山候》锁定于鹿鹿觉巴村,这个彝语命名的村落,既是作者的故乡,也是彝汉文化交融共生的场域。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冲突,而是以生活流、民俗流、情感流的方式多点推进,将时代变革悄然融入日常烟火,将上世纪80年代初,国家层面的乡村政策深刻调整,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被打破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,尤其是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化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这种变化既给家乡带来发展的契机,也引发人们思想观念的碰撞。老毕摩微瑟木是故事的精神轴心,他坚守彝族古老信仰,熟谙经文仪式,在世俗的浪潮中默默地守护着民族文化根脉,成为传统文明的象征与载体。以微瑟木布,阿苏木牛、格播阿夷、佩德支铁等为代表的年轻一代,则在传统婚姻、外出谋生、求学求知的多重选择中苦苦挣扎、徘徊、出走与回归,作者通过对这一群人命运轨迹的刻画,折射出彝族青年在现代化进

程中的精神突围与心灵呐喊。他们与德古老人、基层干部、猎人、教师、普通乡民等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,共同构成了鲜活饱满的彝族社会群体,犹如一幅展现彝区社会重大转型的全景式画卷。

小说命名为《山候》,意蕴深远,耐人寻味。从表层看,“山候”指向山地气候、自然节律、节气物候,大凉山的风霜雨雪、四季轮回。而从深层去解读,“山候”更是时代之候、人心之候、民族文化之候。群山在等候,乡民在等候,一种古老的传统文明在时代变局中等待着凤凰涅槃的新生。作者的这种苦心孤诣双重寓意理念,让小说超越了一般乡土叙事的局限,具备了哲学层面的思考与人文层面的关怀。阿苏越尔以诗人的敏感与细腻,捕捉到传统与现代碰撞中的张力,呈现出二者之间在共存、拉扯、磨合、失落与坚守中的博弈,书写出了社会文化转型中的复杂与真实,使作品拥有了直击人心的磅礴力量。

作为一位从诗人跨界到小说领域的作家,阿苏越尔在《山候》中展现出独特的语言艺术追求。小说微妙地袭袭了他的诗意质感,克制、凝练、富有画面感,文字间流淌着山地的空灵与厚重,读来如沐山风,余味悠长。他将大量彝族民俗、毕摩仪式、山歌谚语自然而然地嵌入娓娓道来的叙事中,充满了鲜活生动的民族学质感,也为普通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彝族文化的窗口。在故事结构上,小说采用了散点透视、群像叙事的方式,开阔而从容,既保留了生活的驳杂形态,又实现了艺术层面的有机统一,与大凉山的地域气质高度契合,可称“大凉山田园牧歌与时代挽歌的

合唱”。

更为可贵的是,《山候》始终扎根于民族精神的内核,张弛有度地描绘着彝族源远流长的精神原乡。以微瑟木的家族历史为情节经纬,让彝族的风情、信仰、伦理、记忆扑面而来,展现出一个民族最质朴的文化基因与最纯粹的精神密码。阿苏越尔用饱含诗意的文字勾勒出大凉山的山川风物、人间烟火、生死悲欢与生命尊严,把每一个具体命运的跌宕融入族群的血脉,整部小说一气呵成,仿佛如同作者献给凉山大地的心灵史诗。毋庸讳言,在现代社会潮流快速推进的今天,传统文化都面临着流失的风险,精神家园的守护已然成为一个重要的命题。《山候》以文学的方式,对这一深刻命题作出深情回应,它既回望传统,凝视文明的根脉,同时也直面现实,潜心地思考着民族的前路与未来,这就让《山候》具有不同凡响的时代价值与文化意义。

从艺术价值上考量,《山候》以其鲜明的民族性、独特的艺术性与深刻的思想性带给我们新意。阿苏越尔以赤子之心书写故土,以敬畏之心传承文化,以悲悯之心观照人生,既有历史的纵深感,又有现实的针对性,更具艺术上的审美情趣。我个人觉得,《山候》的出版不仅仅是阿苏越尔个人在文学创作上的一座里程碑,从广阔的意义上说,也是彝族文学乃至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。

《山候》以沉静文本打动人心,以民族文化的滋养守望我们的精神家园,这是作者用丰赡的文学扎根大地、贴近心灵、守护文脉的一次具有前瞻意义的实践,必将为如火如荼的当代文学创作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熟悉孩子生活,才能写好儿童文学

——《时光妈妈》序

□ 邱易东

因为儿童文学的特殊性,我常常将是否熟悉和把握孩子生活,作为判断作品优劣的首要依据。李颖是川东北山区的小学教师,已经有30多年教龄,《时光妈妈》是她为孩子写的一部长篇小说。讲一个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、自强不息的励志故事,读起来,我不时获得诗意的感染与内心的感动。

李颖熟悉孩子生活,笔下乡村孩子的生活画面,写得历历在目,如在眼前。她善于以乡村环境烘托和表现人物内心,让环境成为人物悲喜的晴雨表。梅集小学“一到春天,树上开满了花,香气扑鼻。蝴蝶和蜜蜂在花间翩翩起舞,孩子们常常追着蜂蝶跑。”正是小雪和同学们快乐学习的天地。“高大的柏树上,停着一只麻雀,看上去孤零零的……”李颖写景物,不是为写而写,而是把人物的言谈举止融入其中,产生诗意的效果。不熟悉孩子生活的作家,自然不会有这样情景交融

的表达。

《时光妈妈》里刻画的人物形象,小雪、奶奶、爸爸、老师、几个好朋友、调皮男生……大多生动鲜活,性格各异,并不雷同。李颖熟悉孩子生活,她刻画的人物,言行举止、音容笑貌,都把握得都比较得体,符合人物特点。比如,小雪“全身被宽大的衣服包裹,像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,显得滑稽又好笑。”好朋友无意的一个笑,引发小雪的敏感,同时激发她的倔强,合情合理,让人信服。而那些不熟悉孩子生活的“作家”,会把人物写得平面机械,故事编得异想天开,不可能像李颖那样,写得真切真实。

《时光妈妈》既是一部励志作品,也是一部校园小说。李颖对各种各样教学活动的描写,每一个都准确到位,有顺手拈来的感觉,新鲜有趣。这在当前儿童文学创作中,确是十分稀缺的。我随口可以举出很

多——野外与野狗对峙,班上作文课、歌咏比赛、课间同学掰手腕,善良的女孩子们对小雪不露声色的呵护……浓浓的生活气息,证明作者对孩子生活烂熟于心。更让人感动的是,秋游时,小雪带石榴与大家分享。石榴抱成一团的甜甜籽儿,不正是孩子们亮晶晶的心!

写这篇小序,无法做到对《时光妈妈》条分缕析,长篇大论,洋洋洒洒。给我感受最深的,就是作者对孩子生活的熟悉。这也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最基本的素养。生活感受深,就能写得好。当前儿童文学出现的题材、人物形象、故事、文学语言等诸多的负面问题,归结到根本,就是写作者对生活不熟悉,缺乏真情实感,写作时瞎编乱造,词不达意。这样的作品,对读者一定是隔膜的。

与读者隔膜的作品,即使写得再好,出版得再多,又有什么意义呢?

读《泸州辞典》,与一座城的骨血相认

□ 明月松

三十五载酒城路,半生归处是泸州。在我十九岁时,一辆长途大巴把我从川北阆中,一路颠簸送往川南泸州。中途在南充歇宿一夜,直到次日黄昏,才终于驶入这座弥漫酒香的江城。从长江畔军营里那个青涩的川北少年,到如今鬓角染霜、口音早已混杂川南腔调的中年,我用了三十五年光阴,将自己重新编译进泸州的晨雾、江风、街巷与四季的醉香里。

我不再是读者,我成了文本里一个缓慢移动的标点,一段带着体温的注脚。直到翻开杨雪先生的《泸州辞典》。那熟稔的震颤从字里行间袭来,非旁观者的素描,而是血缘者的脉动。杨雪不是在编纂词条,他是在以文字为刀刀,剖开一座城的骨血,让每一条纹理都散发故乡的体温。

开卷,便是那滴“酒”。

于我,泸州的酒,是丈量岁月的河床。军

营壮行的激浪,小家团圆的暖流,人生节点的漩涡,皆在其中沉浮。初入喉的凛冽,是闯荡世界的锋芒;回甘的绵长,是家园在体内生根的迹象。杨雪写“红高粱与糯米稻,在川南水土里蓄满灵气”,那灵气经由时光蒸馏,化作的岂止玉液?那是泸州人的集体性格:烈火般的豪爽,包裹着长江水一样的细腻与持久。

“只等梦中的李白,只等梦中的东坡,开瓶畅饮。”

此句一出,千古乡愁与文人侠气共沸。这杯酒,泸州人捧了千年,敬天,敬地,敬过往,敬每一个走进它生命里的异乡人。我饮下,便签了无字的契约,成为这宴席上不再离席的客。

自此,辞典的页码与我生命的足迹开始重叠。

“报恩塔”。新兵时,它的风铃是异乡夜

里潮湿的慰藉,铃声清越,却总敲在乡愁最脆弱的节点。如今望去,方能读懂那“纯粹的高度”——泸州人将“受人之恩,永志不忘”的精神夯入砖石的信仰。风铃摇荡“黄金的光泽”,洞穿灵魂,为我这游子,完成了最初的奠基。

“抚琴台”——杨雪以“孤绝的清流,暗夜的辉光”定格周孝子的决绝。这清流与辉光未曾断绝,流进了街巷的市声,化为了我来这里的三十五年所见,泸州人骨子里那份守善守正、于浊世中自成经纬的脾性。这琴音,是酒城的精神底色,也悄然校准了我——一个军人,后来一名地方建设者——内心那架关于道义的天秤。

“神臂城”与“镇江塔”,一刚一柔,道尽酒城的山河气象。

神臂城曾挡外族铁蹄,泸州人自古便有抱团向前、坚韧不屈的骨气。这股气,撑起了

抗战烽火中的脊梁,也撑起了改革开放后拔节生长的城市天际线。而镇江塔下,曾有的“惊涛裂岸”化作今日“江鸥亲水翔集的小令”。这变迁,我亲眼见证。从沱江两岸的滩涂到南北滨公园的如画,从张坝桂圆林的幽深到福宝古镇的恬然,狂暴的力量最终沉淀为宽厚的从容——这恰是一座古城与一个老兵共同完成的,关于岁月的修行。

最是那“洞宾亭”的“两江清欢”,与汉代石刻《盼归》的千年凝望,戳中我肺腑最温软之处。

亭边,两江合抱,鸥鸟盘旋。杨雪笔下“忧患与灿烂在杯中起伏”的景象,是我每日所见。夜晚万家灯火倒映江中,恍如星河落地,那里面,有一盏是我点亮的。《盼归》中“门缝里的痴情”,则让长江的波涛都化作了温柔的褶皱。我曾是在江边看落日思乡的少年,如今已是牵着孙儿小手,指着归航

船只讲述故事的长者。这座城,用它亘古的流水,教会了我离别的必然与归来的意义。

“历史无解,岁月深处,落英缤纷。”

杨雪的收笔,不是终结,而是将一切情愫,都托付给了流淌的时间。他用数十年光阴为故乡立传。而我,这个曾经的异乡人,用三十五载春秋,以脚步为笔,以悲欢为墨,在泸州的肌理上,默默撰写着一部属于自己的、无形的生命辞典。

《泸州辞典》之所以能走出盆地,登上国刊,也许是因为它超越了方志的记述,抵达了“诗”与“真”的境地。它写的不是地理的泸州,是精神的故乡;注解的不是名词,是千百年来在这片土地上涌动的情感和品格。我们每个人,都是这辞典中一个行走的词。城市在词中不朽,词在人的生命里,获得体温。

本版责编:张语婷

客家文化
与新时代叙事的交响

——评李顺治长篇小说《大河奔涌》

□ 廖友友

作家李顺治潜心十余年,完成了百万字长篇“大河三部曲”(《北河东去》《岷河之上》《大河奔涌》),实在是可喜可贺。尤其是他的收官之作《大河奔涌》,以川西客家聚落作为书写对象,把乡村振兴作为创作主线,以客家青年廖长江的人生轨迹为骨架,把客家人的迁徙文化、民俗传统、精神品格和时代叙事熔于一炉。作为以川西客家题材为主的长篇小说,《大河奔涌》不仅是地域文学的重要收获,更以独特的叙事逻辑和文化视角,为客家题材与乡村振兴书写提供了全新的思考。

在“湖广填四川”的历史背景下,成都东山(龙泉驿区洛带镇、黄土镇,新都区石板滩镇,青白江区清泉镇等)一带,形成了稳定而独特的客家聚居区。他们保留着相对完整的客家方言、宗族礼仪与精神传统。这些客家人说的是三百年前从广东带到四川的客家话(又称土广东话)。尽管客家老祖宗强调“宁卖祖宗田,不丢祖宗言”,但由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人员流动,很多年轻的客家人缺乏语言交流环境,客家话在时代进程中被逐步蚕食,用客家话交流的人越来越少,范围越来越小,客家话、客家习俗面临着逐步消失的可能。因此,客家题材的文学作品,缺乏系统性、规模化的书写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正是在如此语境下,《大河奔涌》的诞生,以虚构的“益都市青白江区东山镇光坡村”为叙事空间,把地域风貌、社会变迁与人物命运熔铸在作品当中,既延续了李劫人“大河小说”书写川西市井与乡土变迁的文学脉络,又劈波斩浪,打通一条客家文化与时代叙事相结合的新路。小说对客家文化的呈现,并非简单堆砌民俗符号,而是将其有机融入叙事之中。更为重要的是,小说深入挖掘客家精神内核:守望相助的宗族伦理、勤俭节约的生活态度、重教崇文的价值追求、不畏艰难的开拓勇气。这些文化特质不仅塑造人物行为逻辑,也推动乡村治理与产业发展,使文化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内在力量,实现了从文化展示到文化赋能的升华。

从文本结构与内在逻辑来看,小说构建了“迁徙实现反转—反转开辟正道—正道撑开开局”的完整叙事链条。迁徙,是客家文化最核心的历史印记,也是贯穿全书的精神主题。从先民辗转入川、落地生根,到主人公廖长江求学、参军、返乡,再到整个村落从贫困落后走向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,小说以“迁徙”为精神动力,把个体命运的转折、乡村发展的转型、时代浪潮的推进层层勾连。这使得客家人艰难的迁徙跋涉,不再只是地理空间的移动,更是精神层面的突围、命运层面的重塑,使客家文化基因与小说叙事机制深度契合,让乡土故事有了文化根脉与历史厚度。在叙事艺术上,作家采用反转叙事,情节如雨点般密集纷扬、错落推进,不断在个人命运、乡村困境、发展路径上形成转折与突破,矛盾与冲突,既增强了故事的戏剧性与可读性,又暗合“迁徙—反转—正道”的内在结构。

在人物塑造上,《大河奔涌》成功塑造了以廖长江为代表的当代客家群体。作为客家青年,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客家人坚韧不拔、耕读传家、重情重义、勇于开拓的精

神品格。出身贫寒却不甘平庸,参军入伍淬炼意志,返乡之后扎根乡土,面对矛盾不回避,面对困境不退缩,以实干带领村庄走出一条生态发展、文化兴村的道路。廖长江的形象,既是客家精神在当代的延续,也是新时代基层建设者的缩影。他的人生起落与乡村发展同频共振,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紧密交织,使人物既有文化底色,又有现实质感,避免了概念化、符号化的书写弊病。

《大河奔涌》坚持现实主义底色,大量融入非虚构元素。比如龙泉山脉、青白江、岷河、大弯中学、石室中学的叙事;《华阳国志》《大宋御史赵口》《郫县志》的史料,以及乡村治理的具体实践、基层工作的真实场景、产业发展的曲折过程,均取材于现实生活,使作品既有文学虚构的艺术张力,又有纪实作品的真实重量。这种虚实结合的写法,给读者的强烈印象和阅读体会:乡村振兴不再是宏大口号,而是可触可感的日常奋斗,让时代叙事落地生根。

作为一部紧扣时代主题的作品,《大河奔涌》的价值,是远不止地域书写与文化呈现的,更在于它对乡村振兴命题的深度回应。乡村振兴不只是经济发展、村容改善,更是文化振兴和精神重塑。“光坡村”本质上是客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。传统伦理与现代治理相融,乡土智慧与生态理念结合,宗族凝聚力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,使村庄既有乡愁记忆,又有时代活力。

李顺治《大河奔涌》是一部扎根川西大地、深植客家文脉、呼应时代主题的优秀长篇小说。它以大河为意象,以迁徙为主线,以正道为追求,以命运为归宿,把以廖长江为代表的个体成长,以光坡村为代表的乡村变迁,以客家迁徙为代表的文化传承与国家发展融为一体,既是一曲献给客家精神的深情颂歌,也是一幅书写乡村振兴的文学画卷。在新时代文学创作中,它以鲜明的地域特色、扎实的现实关怀与独特的文化叙事,彰显了乡土文学的生命力,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创作经验。